

《中亚文明史（第1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亚文明史（第1卷）》

13位ISBN编号：9787500108238

10位ISBN编号：7500108230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作者：A.H.丹尼,V.M.马松

页数：444

译者：芮传明 翻译,余太山 审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中亚文明史（第1卷）》

内容概要

《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追溯了这一广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直到大约公元前700年伟大的阿黑门尼德帝国奠定建国基础之时的人类历史。人类最早的历史因发现石器时代的工具而得到证实，北京人的部分背景便是石器；而如今从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到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则充分体现了食物生产阶段。最为重要的是，青铜时代的伟大文明表明了从印度河到阿姆河最早的城市化进程，证明不同区域之间曾广泛开展贸易。同样重要的是游牧部落的故事，诸如雅利安人的故事，对雅利安人的历史，第一次根据所获得的考古资料从正确的角度进行了观察。

多卷本《中亚文明史》是全面描述中亚文明这一重大主题的首次尝试。出版这套史书与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完全吻合，该组织一个著名的国际专家小组多年来协同合作，已经进行了有关的基础研究，力图向更多的公众介绍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这一辽阔区域的文明史实。

六卷本《中亚文明史》将揭示中亚地区从文明之初到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的兴盛和衰亡。该地区只有很少一些地名，如撒马尔罕、布哈拉或希瓦，是公众所熟悉的；如今一些知名的专家通过此书为我们揭开了帷幕，显示了中亚文明更加丰富多彩的一面。从一个大的范围讲，古代和中古世界史就是由欧亚腹地各族人民的迁徙而形成的，迁徙的范围从西部的黑海一直延伸到东部的中国本土边境。

《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追溯了这一广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直到大约公元前700年伟大的阿黑门尼德帝国奠定建国基础之时的人类历史。人类最早的历史因发现石器时代的工具而得到证实，北京人的部分背景便是石器；而如今从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到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则充分体现了食物生产阶段。最为重要的是，青铜时代的伟大文明表明了从印度河到阿姆河最早的城市化进程，证明不同区域之间曾广泛开展贸易。同样重要的是游牧部落的故事，诸如雅利安人的故事，对雅利安人的历史，第一次根据所获得的考古资料从正确的角度进行了观察。本卷提出新的证据，力除重复的概念，运用熟练技巧，展现了中亚文明的曙光。

《中亚文明史（第1卷）》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丹尼（俄罗斯）马松 译者：芮传明

《中亚文明史（第1卷）》

书籍目录

章节摘录

书摘 他们强调了该地区莫斯特期或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的驳杂性和地方特征。这和见于巴基斯坦及北印度的驳杂性种类相同，但是鉴于其地形及自然环境的其他方面之巨大差异，这种现象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迄于1979年，已有五个莫斯特岩洞遗址和13个大的地面遗存集中处被记录在案，此外尚有54个较小的发掘点。他们将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分成四种，并根据其类型和技术而列出可能存在的第五种，分述如下： 1. 勒瓦娄哇型：具有一个或多个打制台面的石核；三角形和近似矩形的石叶与叶状薄片；大部分为简单的修整过边缘的石块，正式的工具类型则很少。 2. 勒瓦娄哇—莫斯特型：类似于第一类，但是具有更多的台面状和圆盘状的石核；大部分为修整边刃的石叶。 3. 典型的莫斯特型，即山区莫斯特型：这与前面两类有重大区别，即有好几种可明确辨认的工具类型，某些石器(诸如刮削器，以及较小部分的尖状器)类似于具有特色的西欧制品。 4. 索恩传统的莫斯特型：也包括刮削器和传统的莫斯特型尖状器，但是用细砾制作的石斧和砍斫工具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 5. 可能存在的第五个品种，乃是出土于库尔布拉克一个遗址中的细齿状的莫斯特型石器。由于至今尚未能追溯到苏联中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之间的进化联系，因此如何从类型品种方面探索其年代，仍不得而知。然而，存在着某种地区性的分布模式，却可确定。勒瓦娄哇—莫斯特型两种见于苏联中亚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及天山山脉的山麓地带。山区莫斯特型则见于更南的希萨尔山与其他山脉的谷地和悬岩上，引人注目者是特锡克塔什岩洞和奥格泽基奇克(Ogzi—Kichik)岩洞，在前一岩洞中有个尼安德特墓葬。索恩传统的莫斯特型只见于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瓦克什河沿岸。苏联中亚许多莫斯特遗址出土的制品都体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鉴于这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有人便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时间应该往前推移，甚至可能上溯到更新世末期。笔者也倾向于同意这一观点，也将索恩传统的莫斯特型文化看作是适应性地利利用现成原料(即河中的细砾与中砾)，犹如旁遮普省波托瓦尔地区的情况似乎显示的那样。因此可以认为，索恩传统的莫斯特型石器与相邻山区的山区莫斯特型文化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两组石器都体现了正规的制品类型，而这种类型在更北的勒瓦娄哇型和勒瓦娄哇—莫斯特型两组石器中，却未作任何有意义的表达。有鉴于此，这两组石器似乎可能各为某个单一复合体的一部分，只不过各自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行业外表。这在目前还仅仅是推测，但是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论题。从更新世的黄土层和古土壤，以及从岩洞的堆积物中，发现了有关苏联中亚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环境的一些证据。通常说来，这些证据显示了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更为湿润。尤其是古植物学证据，以及岩洞堆积物中发现的动物遗骸，都证实了这一点。有些见于现代的物种，特别是各种绵羊和山羊，还有至今已经灭绝的若干种动物(诸如鬣狗)，都被充分证实存在于这一时期内。有关这一普遍变化模式的清楚例证，见于奥格泽基奇克遗址。人们发现，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所居住过的岩洞中，存在着丰富的文化材料和多种遗骸。特锡克塔什岩洞坐落在班森(Baisun)山脉的一个悬崖的石灰岩峭壁上，而班森山脉则是俯瞰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汗河(Surkhan Darya)流域的希萨尔山脉的向南延展部分。1938年，奥克拉德尼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发掘了特锡克塔什岩洞，获得了有关中亚莫斯特文化或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第一批确凿证据。在这里的五个居住层中，不仅发现大量莫斯特型的制品(其中包括加工过的骨头)，还见到动物遗骸、炉灶，以及其他长期居住的证据。在最后一层居住层中，有一个尼安德特儿童的墓葬，其身周放置着六对西伯利亚山地羊(Capra sibirica)的角。现在看来，这里的石器属于拉诺夫和戴维斯所说的典型的“山区莫斯特型”，这些石器自始至终几乎没有显示出什么变化。岩洞被全部发掘，总共发现了329件工具和2520件修整过的石片和碎片(见图7)。主要的石器类型是对工作边缘作陡峭修整的各种刮削器，包括加工一面或两面的长叶石片，有的尺寸很大，乃至几乎可以归入用石片制作的砍斫工具类；此外，还包括具有莫斯特型特征的尖状器，以及少量简单的雕刻器。当地现成的各种岩型都被加以利用，但是均非最佳的工具原料。在显然供食用的动物的骨头中，西伯利亚山地羊占绝大多数，为总量的83.79%。此外，还发现了野马、豹、棕熊、鬣狗，以及其他许多小型哺乳动物和禽鸟。在同一地区，也是位于峻峭到难以进出的山谷中，阿米尔特米尔(Amir-Temir)岩洞的遗物显示了人类在此有过短暂或偶然的居住，犹如伊朗东部的胡尼克岩洞一样。奥克拉德尼科夫认为，在班森山脚下的丘陵地带可能发现露天的定居地，它们更为经常地由猎羊者居住。或许岩洞文化只表达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居民生活的一个方面，即季节性生活。拉诺夫于1979年发掘的奥格泽基奇克岩洞，坐落在塔吉克斯坦瓦克什山脉南麓的一个隐蔽的小山谷中。它在一座石灰石悬岩的脚下，距离如今已经干涸的一股泉水极近。旧石器和动物遗骸都表明，莫斯特时期的气候更为湿润，岩洞下方可能还有个水池。动物中包括龟，它们大约生活在水

池中；此外尚有野马、红鹿、犀牛等，它们基本上始终存在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居住区。在炉灶内发现了龟的遗骸，表明它们是被连壳一起烤熟的。这里的石器制作类似于特锡克塔什所见者，同样属于典型的山区莫斯特型，但是也有其自己的地方特色，它也以当地各种类型的现成岩石为基础。与特锡克塔什形成对照的是，奥格泽基奇克遗址的最佳居住层是在紧靠洞外下方的斜坡上，岩洞在以前可能更大些。发掘出来的制品约有一万件，包括加工过的石块、石核和修整的石片等。整个发掘现场都见到显然是被人类折断的骨骼残片以及巨大的炉灶。还有一个用石块堆成的椭圆形设置，约宽1.5米，一端摆着两只野山羊角。由于这一设施并未与墓葬放在一起，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神坛。

蒙古高原 除上文所讨论的诸地区外，我们还应提到在蒙古高原上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它们使得该地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情况明朗化起来。它们见于南戈壁的奥茨通门特(Otstonmant)与古尔凡锡汗(Gurvan Sikhan)、戈壁—阿尔泰省的圣伊赫(Ikh Bogd)，以及南杭爱省的圣阿尔茨(Arts-Bogd)。在第一个遗址发现了具有勒瓦娄哇风格的石核和石片；相邻的遗址则有许多莫斯特时期工具。圣伊赫遗址有一些用火成岩制作的工具，被确定为类似的莫斯特时期文化。在圣阿尔茨发掘出一个石器加工工场，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石质工具，尤其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那些红色碧玉工具。在戈壁—阿尔泰地区的锡尔兹山谷中，在东部蒙古的三个遗址(位于巴龙乌尔特诸城与德尔盖里赫区附近的赛音山达之间)中，以及在鄂尔浑河畔的穆伊尔廷谷(Moiltyn-am)遗址，都发现了地面材料。最后一个遗址提供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的连续地层。蒙古地区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时期材料似乎与阿尔泰山地区及西伯利亚的材料有关，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则显示了与北亚石器的某种类似性。

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苏联中亚的山地岩洞遗址，比本章简单涉及到的整个地区内的其他任何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都更多地展示了岩洞居住者身处的自然环境的文化状况。我们在开首时指出，单从石器方面就可以推导出当时人类的心理状态是什么。随后我们又看到，地面遗址的分布状况和不同性质，如何使石器又增添进一步的文化范围；以及在分析地面遗址的分布和不同性质后获得的概貌，如何因为将它尽可能与当时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而更为详备，并赋予更大的意义。这使我们得以理解制造这些工具的人类群落的生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一旦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文化时，信德和中亚其他各地巨大的石器加工遗址和露天生活遗址，便能产生有关群落关系的极为有趣的一些问题。例如，其问题是：在南亚和中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交流网络究竟发展到多大范围？……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于中世纪晚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中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商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伊朗的文明中心虽然地处西南亚，但它的影响特别强，以致于有时竟难以明确界定伊朗本土文明与中亚边远地区的文明。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受到多重的外来影响。千百年来，该地区不断涌入外来的艺术和思想，撞击着中亚固有的模式并逐渐与之融合。移民和经常发生的军事入侵的冲击，使一些民族和文化或融合，或取替，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世世代代人口流动的收缩和扩张更增加了界定这一地区的困难，因为仅靠其地表无法得出明确界限。因此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范围。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教科文组织号召专家，尤其是中亚地区当地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并得到广泛而慷慨的响应。学术界认为这一项目是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的极好机会。然而，这项任务工程之浩大是谁也不会怀疑的。1980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国际科学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进计划筹和筹备，并商定出版六卷本中亚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今天。该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是决定眼前这幅宽阔的画布上哪一部分应最为突出。通过适当的过程，已作出公平的安排，并选出了主编和作者队伍。目前，《中亚文明史》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研究和考古方面所用的各种资源都是最好的，以求工作精益求精；在该地区各大中心查阅的编年史数不胜数。我衷心祝愿本书第三卷和以后各卷对世界的读者有所教益，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我还要感谢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委员，以及主编、作者和各组专家，他们通力合作，详细叙述了中亚地区那极其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使人们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确信这部史学著作必将证明是对研究各国文化并使之互相欣赏的一项显著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精彩短评

- 1、总共六册书，写得很认真。
- 2、其实五星有点高.....
- 3、整个看上去是仓库里面压箱底的，灰蒙蒙的，书面凹凸不平，有折印。因此不喜欢，应该是原版也比较脏，然后运输途中又不注意。
- 4、收书的时间长了些，不过书收到后很满意
- 5、文明在冲突中互相融合。
- 6、没有花哨的包装，有的是详实的内容，好书！
- 7、值得一看 考古资料
- 8、不错，内容精彩，值得一看
- 9、第一卷有很多考古的内容，容易让人产生阅读障碍，不过还是挺苦中作乐的
- 10、这对学习研究中亚历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本教材，发货速度也很满意！
- 1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即将历史认识的对象，理解为一种文明，即物质的以及精神的文化实体。是广义的不同于社会进化史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对考古学实物资料的重视，是因为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比较缺乏的缘故，中亚历史本身也更像是用实物构筑而成的。地处欧亚大陆而非单纯是亚洲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中亚史的世界史特征及其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环境因素。食物生产技术以及文化的进步，论述文明问题的主线索，区分出不同变化中的生存模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与捕食者共存，居于中亚的北部和东部，从事狩猎渔捕及食物采集。游动的农耕生活和稍后游牧生活的发展，使人群的机动性增加，迁徙移居。定居文明出现后的阶段，成为早期冶金时期的一部分。几乎全部采用了考古学的资料。第一卷目的在于论及全人类史前史中所有这些重要的里程碑。
- 12、简体横排，0年1版03年2印，正文368页，总共444页，6折。
- 13、很好，5折
- 14、可以看，总体偏于文化和考古
- 15、书里讲了一大堆考古遗址，非常详细，可惜配图就太少了。
- 16、远古时期直至700BCE，多国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导下共同编写。第一卷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指出西南中亚在五六千年前，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有隐秘的关联性，比如陶器，比如建筑.....（马松 论文）这一点国内较少提及。
- 17、有些凌乱，相信是因为作者太多，文笔无法统一之故！毕竟提供了大量信息！
- 18、翻译有点艰涩，可作为资料保存
- 19、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文史类
- 20、这些书的内容非常不做

章节试读

1、《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十五、十六章

第十五章 印度-伊朗人的出现：印度-伊朗语（J.哈尔马塔）266-285页

一、印度-伊朗人的原居地

一个理论将中亚（狭义的“中亚”）及其以北的地区视作印度-伊朗人的最早居地；而另一种观点则试图将其置于东欧草原上。显然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排斥。……这两种说法的选择，取决于原始印度-伊朗语在印度-伊朗诸语中的位置。

二、印度-伊朗人的扩散

原始印度-伊朗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畜牧业兴起为开端，饲养家畜包括，钮、绵羊、山羊、猪和狗等，主要经济为畜牧业。出现了两轮或四轮牛车。

第二个阶段以牧马为特色，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这一事件根本性的改变可畜牧业的范围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大种马，辐条轮轻便车辆以及战车的引入。社会繁华加剧、王室贵族和武士阶层发展起来。印度-伊朗人对周围邻近地区，由上一阶段的缓慢渗透到此时大规模的开拓和入侵，尤其这一阶段其南方和东南方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第三阶段以掌握的骑马术为特征，这使原始印度-伊朗人（准确的说，应该是原始伊朗人，因为原始印度人已经在第二阶段末期离开了这里，奔赴东南方）得以发展游牧的养马业，并组织起庞大的骑兵。于是，他们成为了骑马的游牧人，大量的马群迫使他们定期的变换牧场，而其单一的经济又驱使其与邻近的农业居民建立起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或通过贸易、或通过劫掠和入侵而建立。气候变化使得游牧人寻找新的牧场，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族迁徙运动。

三、原始印度人与原始伊朗人的迁移及其迁徙路线

可以推测，公元前三千纪，原始印度人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向南方移动，征服了戈尔甘河流域，从而引发了异于从前的黑-灰陶器的兴起和扩散。本文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不评。不过各学科的研究最终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

第十六章 阿姆河流域（巴克特里亚）青铜时代的畜牧部落（B.A.李特文斯基 L.T.皮延科娃）286-298页 描述巴克特里亚青铜时代文化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代之遗存的相互关系。

有关这一文化的起源，存在长期的争论。

中亚的“雅利安化”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和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当时，它与原始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冲击波有关。这一进程在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变得越来越强烈，此时便具有了“原始伊朗人”色彩。这一进程及其复杂，且持续时间相当长，原始伊朗人的冲击波施加于土著居民及其雅利安化的成分之上，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合成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合成。

2、《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十三章 238-249页

第十三章 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安志敏）

一、甘肃省的早期文化遗存

1、齐家文化：考古学文化名称的由来；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期，C14侧年数据为2200B.C.-1600B.C.，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为同一时代，或稍晚。

冶金技术的出现，是其一显著成就。小型青铜器，工具和装饰品，“红铜制作的器物最多，64%，铅青铜5%，锡青铜10%。冷锻法和单范铸法是红铜工艺的特征，表明冶金工艺虽已开始，但仍处于原始阶段。但用合范法铸造的釜斧和铜镜，则表明齐家文化后期进入了青铜时代。”

制陶技术，红陶为主，少量灰陶。均为手制，未见轮制的证据。彩陶罕见（显露出马家窑文化的遥远影响）。

Point：目前，我们对齐家文化的认识已经不止于此，它与陕西龙山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关系，

已产生了更多更加细节的研究。此处的测年数据的下限现已晚至1400B.C.，同时不排除齐家文化出现铁器的可能，详细内容见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发掘报告。

2、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属于独立发展而成的一种文化。”

畜牧业发达，但仍以农业为经济的基础。蒙古人种。经树木年轮校订的C14测年数据为1700B.C-700B.C.，与中原地区的商代早期年代相当，不排除二者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

Point：我们更关注四坝文化与东天山地区北部的哈密盆地在公元前一千纪及更早时候的文化交流，它们是天山北路文化（早期也有称雅林办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我们认为，四坝文化与天山北路文化存在着较多的交流，其文化交流的背景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黑海北岸颜那亚文化（也称库尔干文化Kurgn Culture）居民的迁徙，而焉不拉克文化则是主要继承了天山北路文化的主要因素而兴起的一种当地土著文化，同时它与晚期的四坝文化也存在联系。

二、甘肃和青海的晚期文化遗存

1、辛店文化（甘肃临洮辛店）

“以辛店文化为代表的遗存，可能是古羌人的一支族后裔的文化，这些居民生活在西周时期的甘肃和青海，并与西周保持着接触交流。”

2、唐汪文化（甘肃东乡唐汪川）

张家嘴类型、上孙家寨类型，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密切关联。

3、寺洼文化（甘肃临洮寺洼山）

分布地区与辛店文化及西周文化区相毗邻，因此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火葬的出现，值得注意。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中，都提到了羌人的这种习俗。结合寺洼文化的地理分布，我们可以推测它与羌人有一定的关系。

4、卡约文化（青海湟中）

“卡约文化的遗物往往叠压在马家窑文化层或齐家文化文化层之上，这表明它的时代更晚一些。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与西周之间的那个时期。至于这里的居民，则也属于古代羌人的范畴。”

5、沙井文化（甘肃民勤）

与四坝文化的特征类似，只是其时代较晚，公元前一千纪上半段。蒙古人种。

三、新疆的文化遗存

目前资料已更新，书中说法已多不采用。

相关内容参考可参考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一书。

内容干瘪，仅仅是举例，关联性的内容太少。这样的文章，把报告找全了谁都可以写。当然，这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准，并且，考虑到当时的考古学研究深受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所以，今天的读者不能要求苛刻。

对文不对人，安志敏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博大深沉，是当之无愧的著名考古学家。

3、《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十七、十八章

第十七章 后印度河文明时期巴基斯坦的畜牧-农业部落（A.H.丹尼）299-319页

键陀罗墓葬文化（史前文化）；皮拉克文化；H墓地文化；戈马尔墓葬文化所有的材料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层次，它标志着整个中亚地区社会-人种变革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肯定有别于以旧城市制度之崩溃为结尾的青铜时代早期文明。这种社会变革是根本性的，应该以广泛传播的文化运动的新框架来理解，这一运动影响了基本上隔离与山区之中、仍以传统的食物生产模式生活着得那些居民。虽然新的变革并未加速生产的过程，但是毕竟使农村居民的总布局发生了变化，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生活方式的经济方面固然没有多大的改善，但是社会和文化方面则迥异于从前。马和战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北方和西方多山地区的流行程度，更甚于遥远的中国或印度的平原地带。西方的山地成为揭示这些居民之秘密的关键。少量零星的材料（如玉）似乎来自中国，但是这不会妨碍有关这一文化区的观念。同样的，有些绘画可能借鉴了印度河文明中的某些母题，但是应该理解成西方材料

的更广泛分布。因此，最初见于墓葬，如今亦见于几个居住区内的文物，为我们理解该时期的文献证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十八章 铁器时代的绘彩灰陶文化（B.B.拉尔）320-336页

印度河文明之末（约公元前1500年）与历史时期之初（约公元前60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被视作印度史前时期的“黑暗时代”。

大部分进行合理发掘的地面遗址只有一个——巴格旺普拉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绘彩灰陶的居民从事渔猎和狩猎，那里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于这些经济活动。

开始使用铁器，但铜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金属，一项引人入胜的成就是玻璃制作技术。

印度河文明的很多方面是伟大的，但是不少东西最终没能遗留下来。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种种原因，印度河文明衰退了。但是，与雅利安人同种的绘彩灰陶文化的创造者们，却播下了哲学思想的种子，这使得印度闻名于全世界，这不仅仅是精神财富，其对物质生活的贡献也意义重大。他们的铁器技术，最早影响了恒河-亚穆纳河流域的定居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此外，正是在绘彩灰陶时期，北印度迎来了“第二次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他们的直接后裔，即北方磨光黑陶的居民，又夺回了昔日的荣耀。在绘彩灰陶居民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兴起了新的上层建筑，从而在公元前六世纪和前五世纪，不仅有传奇性的大乘佛教繁荣在由优填王、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等统治的国度内，还出现了伟大的宗教导师，大雄和佛陀。

4、《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二十章 352-364页

第二十章 公元前一千纪初的畜牧与游牧部落（A.阿斯卡洛夫、V.伏尔科夫、N.赛尔欧嘉夫）

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人是亚洲游牧人，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即使他们分居各地，经济习惯与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半游牧或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拥有了许多共同的文化特色，所以，人们便产生了“所有的游牧人都具有类似文化”的认识。

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是由卡拉苏克文化完成的，中亚北部许多历史遗迹的年代均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墓葬相仿，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它们都属于卡拉苏克文化的范畴。

卡拉苏克文化：墓葬—墓葬形制（石棺、石板）、葬式（屈肢、仰身直肢）、单人葬居多、出现随葬品等级分化；陶器—呈球形，圆底或平底，折线纹，黑底白彩；工具—青铜匕首，动物形的柄端或把手；经济方式—畜牧业，绵羊与山羊，马的骑乘。

文化交流与地域差异：多个地方类型，各地区均发现了相同的青铜器，但是或多或少的均具有地方色彩——马的骑乘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机动性，刺激了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起源：“就文化和人种方面而言，卡拉苏克文化来源于南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其家庭和部落牧地的重新分配，以及部落的重新组合和迁移。这使一种新的文化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形成，但是这种文化并不是纯粹一致的。卡拉苏克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间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陶器的器形和装饰上。

中亚东部的早期游牧人时代，我们又称为“斯基泰时期”，此时，蒙古高原以及欧亚草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最终确立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相伴随的一切技术成就。

游牧生活方式的发展，极富表现力的游牧艺术的成长。加之运输工具的改良，马的骑乘，促使着相隔遥远的各部落间进行着接触与交流。这又导致了游牧部落的文化一体化，并形成了庞大的历史-文化群体，这便是“斯基泰-西伯利亚”族群，其特色是“斯基泰三位一体”：武器、马具和动物风格的艺术。这一文化共同体分布广泛，从西方的多瑙河一直到东方的阿穆尔（Amur）河。并非用“文化交流”就可以解释有关斯基泰-西伯利亚共同体的全部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欧亚畜牧人居住环境的类似性（空旷的草原空间和半沙漠的山区）、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游牧的牲畜饲养）、游牧生活、大体上相同的社会发展程度（以部落内部相当的财产与社会地位差异，以及草原贵族阶层之出现为标志）、在很大程度上由类似的经济与社会隐私所决定的类似的意识形态（这反映在共同的宗教崇拜和艺术表达形式中）等等因素，都肯定在其文化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最后一个因素在于人种方面：因部落迁徙而最终主宰草原的人种统一体，属于印度-伊朗人种，学者们通常认为他们包括了黑海地区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和中亚的赛克人（Sakas）。

Point：有关中亚东部蒙古高原早期铁器时代的相关情况，参考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 即《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书。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早期游牧部落的强大群体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形成了,他们与此时的东方强国一样,以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从此,东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

5、《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十九章 337-351页

第十九章 外阿姆河流域铁器时代的开端 (A.阿斯卡洛夫)

铁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技术革命,但是,在最初,它是作为装饰品被人们收藏起来的,它的广泛使用发展的非常缓慢。

早期铁器时代的苏联中亚地区可分为两个大区:北方主要居住着以畜牧为生的草原部落,南方则是拥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的古代东方型聚落。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并且,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接触,相互交流文化和经济成就。

所有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发生,都既可能是和平的文化和聚落间的渗透,也可能是通过征战而获得。根据最后的分析,定居者和游牧者之间接触的总结果乃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早期铁器时代进程中的主要特色,即农业与手工业跳跃式的前进。这与人工灌溉系统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从牧-耕型生活转向季节性放牧、牲畜饲养和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采纳新的经济方式,乃是新的文化和经济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在苏联中亚早期铁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方面有生动的反映。

1、阿米拉巴德文化:古代花刺子模地区,公元前十世纪至前八世纪

2、北塔吉斯肯部落的文化:塔吉斯肯(Tagisken)高原北部直至咸海之东

3、楚斯特文化: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和一千纪前期,费尔干纳盆地,定居的农耕文化,彩陶(Point:中亚的彩陶-青铜时代,新疆的彩陶-早期铁器时代,甘青的彩陶-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4、苏联中亚南部及阿富汗北部的聚落:南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四、五期文化,南乌兹别克斯坦的帕萨利文化

5、达希斯坦文化:定居农业文化,源于伊朗里海地区 公元前二千纪与一千纪之交,苏联中亚的奉行多种宗教信仰,早期铁器时代最普遍的一种信仰是对火的崇拜,它象征神圣的正义。就考古方面而言,这种崇拜则体现为包括一些小的祭祀遗存的庙宇建筑物。

苏联中亚南部在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一千纪的前三分之一)出现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但是,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却十分复杂:在阿姆河下游的花刺子模地区,形成了一种基于草原青铜时代传统的定居文化;在帕提亚、马尔吉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主要绿洲中,出现了与当地的经济传统(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传统)具有明显延续性的文化演变;咸海南部地区塔吉斯肯为地方贵族建造的纪念性陵墓,部分地揭示了其文化联系;主要建筑技术和标准显然起源于南方。当南方的定居绿洲展示出全面的文化一致性时,我们也隐约看到了原有的地方特色,它们预示了诸如帕提亚人、花刺子模人和巴克特里亚人等古老民族的文化特征。

6、《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结论和附录

结论(编者)

“缄默无言的器物表明了人类发展的道路。……历史再现了许多业已被遗忘的民族和部落,对于他们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他们持续不断的研究,却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以此来了解中亚居民及其文化的起源。”

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说文化的发展是孤立的。考古发现所揭示的这些文化的各种特征,表现出人类接触交流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物品和思想观念的交换。

进一步的考古学工作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建立完善的历史框架。本卷的作者仅仅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历史所遵循的合理发展做出的适当推测,结论当然具有启发性,但不可避免的也存在局限性。

附录 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 (L.I.米罗什尼科夫)

中亚(Central Asia);中部亚洲(Middle Asia);内陆亚洲(Inner Asia,又称亚洲腹地)

“中亚”包括“今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牢记一点的是，中亚居民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才是本书研究的主题，而地理边界也不应视作一成不变的。 Point：对于遥远的历史研究而言，目前的行政边界不具有任何意义，它只会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而这，并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本卷完。

7、《中亚文明史（第1卷）》的笔记-第十四章 250-265页

第十四章 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与部落迁移（V.M.马松）

“公元前二千纪，中亚广大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变动，整个人种文化构图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以前高度发达的定居文化中心全部衰落崩溃（e.g.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型文化）。进一步的考古学发掘显示，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城市中心的衰落和而解体，有些只是文化的演变，而非崩溃。

……苏联中亚的草原地区同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公元前二千纪，这里的狩猎者和渔猎者的文化，被来自草原和半沙漠地区的畜牧者的文化所取代，后者给后世留下了所谓“草原青铜器”的文化遗物。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历史形势。机动、精力充沛和资源丰富的畜牧者，利用马拉的轻便战车，向四面八方进军。我们有毋庸置疑的证据表明，他们曾与南方定居文明的居民进行积极的接触交流，并对后者的命运发挥了主要作用。

公元前二千纪的历史发展，乃是以迁徙运动、社会演变及文化交流为特色的复杂模式。”

……

阿姆河中游地区发现的高质量的日用陶器是上述两个文明相互交流的明证。

草原部落铁器时代进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二千纪形成了其早期文化。

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只是决定性变化的先驱，在草原和半沙漠地区，这些变化与三个现象有关：青铜冶炼术的传播、马拉战车的使用、兼容畜牧与农耕经济类型的普遍巩固。

Point：文中关于辛塔什塔文化的认识目前已更正，现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上半段。

安德罗诺沃文化在中亚的扩张，形成多个地方类型。

北印度形成新型的文化，新文化因素与当地青铜时代的文化传统结合，在随后的发展中，以心要素为主导，形成了铁器时代早期的绘彩灰陶文化，这与最初的雅利安王国的文化相一致。

“一切证据表明，公元前二千纪中亚所发生的事件，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很难将其缩减到一个单独的共同因素。

或许，我们面对的是由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模式，它削弱了构成中亚青铜时代文明基础的、已不再稳固的那些制度。……经学者们确认的部落迁移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括部落群体的逐步迁徙，这些部落群在迁徙过程中与土著居民融合起来。在其漫长的旅途中，他们身后留下星星点点的墓地，埋葬着去世的部落成员，这些墓地，如今成为考古学者认真研究的目标。”

公元前三千纪末和二千纪上半叶外阿姆河地区气候变得更加干燥，哈拉帕型文明中心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按照专家的看法，这与人类社会本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关。

“公元前二千纪，历史和地理的构图发生了变化，高度发达的定居文化的新中心出现在马尔吉亚那和巴克特里亚。但是，每个新文化特色，几乎都不仅仅是其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大部分来自草原游牧世界的新居民们的到来有关。这便产生了一个文化综合体，它以结合了古老的文化要素的青铜时代文明为特征。正是通过如此复杂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新的人种社会才得以形成，而这些社会大部分又与印度-伊朗聚落有关。”

文章内容十分充实，由点及面的联系，形成较为全面的知识系统和网络。只是翻译仍存在问题，有时间的话建议阅读英文版。

《中亚文明史（第1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